

## 試論梁鼎芬與張之洞的關係

◎ 武增鋒 韓春英

梁鼎芬（1859–1920），字星海，號節庵，廣東番禺人。曾任直隸州知州、武昌知府、湖北安襄鄖荊道、湖北按察使、布政使等職。早年以科舉入仕，授翰林院編修，中法戰爭期間入張之洞幕。作為張之洞幕府的得力幹將，他參與了張之洞大部分政治活動，二人關係頗為密切。他們二人的關係是張之洞幕府中的一個典型代表。研究梁鼎芬與張之洞的關係，不僅對研究張之洞、梁鼎芬個體思想變化有重要意義，而且對深入研究張之洞幕府大有裨益。然而由於關於梁鼎芬的資料甚少<sup>1</sup>，迄今為止，學界對二人關係的研究幾乎尚屬空白，專題論文依然闕如。有鑒於此，本文擬對二人關係做些粗淺探索。

### 一、張之洞宦海中的得力僚屬

梁鼎芬早年以科舉入仕，1883年23歲時，被授職為翰林院編修。1884年上書彈劾李鴻章，名震朝野，「至比之楊忠愍之參嚴嵩」。<sup>2</sup>但卻因此觸怒慈禧太后，「幾罹重譴」，遂於1885年辭官歸鄉。中法戰爭前後，加入張之洞幕府。

梁鼎芬自受聘入幕，即成為張之洞仕途中的智囊，力參運籌帷幄事宜。「文襄（張之洞）大事必以諮詢，輒深談竟夜，習以為常」。<sup>3</sup>維新運動興起之初，梁鼎芬為張之洞與維新派的合作引線搭橋。1895年8月，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組織的強學會在北京成立時，張之洞捐資5000兩作為會費，表現出積極支援之態。繼而，康有為南下與張之洞商議組織上海強學會，梁鼎芬斡旋於張、康間，成為二人合作的重要促成者。

那麼，為何梁鼎芬能促成張康合作呢？梁鼎芬與康有為有同鄉之誼。且康有為與梁鼎芬十六舅張鼎華為忘年之交，這更加深了梁鼎芬與康有為的情感紐帶。自梁鼎芬入翰林初次認識康有為始，二人「恒有往還」，<sup>4</sup>而後，結成「至交」。<sup>5</sup>1885年梁鼎芬辭京回籍，會見康有為，康曾賦詩感懷：「一別三年京國秋，冬殘相見慰離憂。代陳北闕有封事，醉臥西風剩酒樓。芍藥翻紅春欲老，杜鵑啼碧澗之幽。繁花零落故人往，惆悵當時舊輩流」。<sup>6</sup>梁鼎芬很欣賞康有為通中西學之識，謀強國路之志，以「天下士」<sup>7</sup>視之。1895年康有為欲在上海創強學會時，張之洞也正苦於尋求救世之道。因此，深知張之洞心思的梁鼎芬極力促成張康合作。是年11月康有為來到江寧。此時，張之洞正因次子張仁頌溺死而傷痛不已。梁鼎芬為替張排憂，生出一策，勸張之洞與康有為談書論說「藉以排遣」。梁鼎芬說：「比聞公傷悼不已，敬念無既，今思一排遣之法：長素健談，可以終日相對，……使之發揮中西之學，近時士夫之論，使人心開」。<sup>8</sup>經梁鼎芬牽線，康有為在江甯，「居二十餘日」，與張之洞「隔日一談，每至夜深」，<sup>9</sup>從而得以「合請香濤為發起人」，<sup>10</sup>並促成張之洞慨然應允捐資1500兩作

為會費。

梁鼎芬還極力促成了張之洞支援、贊助《時務報》創刊。上海強學會成立不久，即受北京強學會牽連而停辦。1896年1月20日，頑固守舊人物楊崇伊彈劾北京強學會「植黨營私」，專門販賣西學書籍，北京強學會因而被查禁。張之洞聞之恐受牽連，立即電囑停辦上海強學會。但維新人士並未就此放棄維新變法宣傳。黃遵憲與汪康年欲籌辦《時務報》。為謀求張之洞支援，他們屢次致函梁鼎芬求援。為開報館事梁鼎芬鼎力相助，「屢向南皮言之」，<sup>11</sup>最後促使張之洞支援《時務報》，使得該報於1896年8月9日創刊，從而使張之洞的救國心志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釋懷。

但梁鼎芬畢竟不是維新派。在對待維新活動的態度上，他與幕主張之洞基本相同。他試圖將維新活動納入「中體西用」的洋務軌道，於是他又成為張之洞干預《時務報》的仲介人。在《時務報》刊行過程中，梁鼎芬總是「嚴加匡正」。對於其內容中與「中體西用」的洋務綱領相契合者，他表示欲作「楹貼」予以稱讚；對於越出「中體西用」軌跡的，他則極力抑壓。他曾多次致書汪康年，關照「以後文字，真要小心」。<sup>12</sup>當1897年11月梁啟超在《時務報》刊發《變法通議》大倡民權時，他則警示汪康年：「民權文字亦不佳，千萬不可動筆」，並責問汪：「弟自云不附康，所以至是？」要求汪：「處華夷紛雜之區……當存君國之志，勿惑於邪說，勿誤於迷途」。<sup>13</sup>

1898年康梁組織保國會後，頑固守舊派詆毀排斥之勢日盛，帝後黨爭如箭在弦。幾經政治風雨的張之洞諳熟政局，因而深恐自己被人揭露與維新派的關係，急欲表明在政治上忠於慈禧而有別於康梁的心跡。但他又猶豫不決，「不敢公發難端」，於是「作書與梁節庵云：『康學大興，可謂狂悖！如何，如何！』」向梁鼎芬謀求對策。梁答云：「賊猖悖，則討之，不當云『如何』也。」<sup>14</sup>梁鼎芬審時度勢，認為「康梁必敗」。因此，他為張之洞出謀劃策，勸張明確劃清與維新派界限。在梁鼎芬的勸告下，張之洞於5月即有《勸學篇》出臺。10月16日，梁鼎芬、朱一新等又將書中忠君衛道部分一一檢注，重編成冊，而後收入《翼教叢編》，成為反對維新運動的代表作。張達驥在談及《勸學篇》來由時也說：張之洞與康、梁斷絕關係前，曾著《強學篇》，提倡變法。後風聲日緊，便大加修改，易名為《勸學篇》，內容以忠君愛國、尊經守道為說教，隱示新法不可行、舊法不可變之意；又將此文精繕成冊進呈慈禧禦覽，用以表示其反對變法之態度。由此可見，張之洞《勸學篇》的問世與梁鼎芬的影響不無關係。<sup>15</sup>

此間，張之洞還欲創辦自己的輿論陣地——《正學報》，「以昌明正學，宏揚聖道」，<sup>16</sup>表其忠君衛道立場。張之洞又將此重任委於梁鼎芬，「《正學報》請梁節庵太史總理」，「一切館內事宜，凡選刻各報及人撰述文字，均須節庵核定方可印行」。<sup>17</sup>梁鼎芬也不負張之洞厚望，以筆代刀，口誅筆伐康有為等，罵康黨為「無父、無君、無人理之逆犯」，「罪通於天，願天誅之；毒加於人，願人殛之」。<sup>18</sup>其疏劾維新志士的文章「詞氣壯厲」，忠君情切，被「合刊千本，分散兩湖人士」，<sup>19</sup>頗有影響力。梁鼎芬的所作所為，不僅表明了張梁關係非同一般，也向世人表明了張之洞的忠君立場，助張之洞與維新派脫離干係，在戊戌政變的風波中站穩腳跟。

義和團運動時期，梁鼎芬又促成張之洞鎮壓自立軍起義。1900年春夏之交，當北方義和團運動蓬勃發展時，維新派唐才常等領導自立會成立自立軍，準備發動起義。在對待自立軍問題

上，起初張之洞態度曖昧。當時，「唐才常托日人勸告張之洞接受自立軍的擁護，宣佈兩湖獨立，張之洞觀望形勢，不表示態度，也不出面干涉」。<sup>20</sup>黃浚也說，唐才常曾「頗運動南皮合作，南皮亦頗有所動」。<sup>21</sup>唐才常原為張之洞門生，此事似有可能。從梁鼎芬的一封信箋中也可得到佐證。1900年5月，梁鼎芬恐張之洞「顧忌遊移，心慈手軟」，而「與佛塵合作」，故針對此事致函張之洞，以忠孝之道警示張：「禍將不測，看此舉動，明系合夥同謀，妄思欺奪君權，破裂孔教。鼎芬定計辦理此股賊匪，心力堅果，本可不必商量。敬念我公清望冠時，素以天下為己任，殺賊報國，肅清海宇，功有專屬，責有專歸，此等大事，當語仁公，首先料理」。並悚以危言，若「隱憂於私室，不能昌論於公廷，徘徊一月，纏綿千語，計尚未定，賊已渡河，此時縱有百部守約書，百處正學報，百間武備學堂，於事已恐無濟」。為達到說服目的，梁鼎芬還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區區愚誠，上愛吾君，下愛吾友，國危至此，賊勢猖獗又至此，真不勝痛憤憂迫之至」，「鼎芬即還我故山，合天下志士，勢滅此賊」。<sup>22</sup>在梁鼎芬的苦勸下，張之洞審時度勢，於1900年8月22日，在英國人的密切配合下逮捕了唐才常等人。加之湖北巡撫於蔭霖力的影響，遂將唐才常等殺害。<sup>23</sup>緊要關頭，梁鼎芬又助張之洞作出決策，使其在晚清政局的風雨飄搖中穩如磐石。

總之，在張之洞宦海生涯中，梁鼎芬推波助瀾，擋風遮雨，盡其能事，力助張之洞度過晚清政局中的重要轉折時期。因此，他不愧為張之洞身邊智囊，最為得力的幕僚之一。

## 二、 輔佐張之洞辦洋務教育

梁鼎芬因彈劾李鴻章棄官回籍後，張之洞「高其風節」，慕其「學問如此淵博」<sup>24</sup>，遂於1886年4月延請他主講惠州豐湖書院。1887年夏他又轉任「為兩廣培養人才之區」的肇慶端溪書院山長。此後，梁鼎芬開始為張之洞辦教育出謀劃策，協助張之洞推進了近代洋務教育的發展。談起張之洞的教育功績，梁鼎芬功不可沒。時人稱張之洞每「言學務惟鼎芬是任」<sup>25</sup>。

1887年，張之洞鑒於端溪書院「究屬偏僻，書院舊有齋務過少，不足於容兩廣英才」，提出在廣州創建廣雅書院。梁鼎芬極為讚賞張之洞創辦廣雅書院，曾說：「公開府兩廣，設書院書局，皆以廣雅名，又以自名其堂。廣者大也，雅者正也，大而能正，公無愧焉」<sup>26</sup>。在廣雅書院的創建過程中，張之洞常與梁鼎芬商議辦學之事。1888年春，書院建成後，梁鼎芬「率端溪書院經古諸生」並入，<sup>27</sup>並出任首任院長。在廣雅書院，梁鼎芬具體推行「新舊兼陳」的教育體制。他採用分科教學的方式，設經學、史學、理學和經濟四科，使書院具備了現代學校的雛形。在張之洞教育思想指導下，加之梁鼎芬的勤勉努力，廣雅書院很快辦學有成，並在社會上產生較大影響，後來曾一度成為廣東的學術文化中心。

1892年張之洞在湖北創建兩湖書院，遂邀梁鼎芬出任史學分教，主講中學。自此，梁鼎芬與張之洞幾乎形影不離，成為張之洞創辦近代教育的得力助手。1894年張之洞代劉坤一署兩江總督，複聘梁鼎芬任鍾山書院山長。<sup>28</sup>1895年底，張之洞回任湖廣總督，梁鼎芬亦辭別鍾山書院隨到湖北。湖北是張之洞悉心經營之地。自1889年任總督一直到1907年進京，其間除兩次臨時署兩江及入京制訂癸卯學制外，張之洞督鄂長達17年之久。在湖北，他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其中尤以辦教育功績最為卓著。梁鼎芬則是其得力助手。張繼煦在談到張之洞督鄂時說，「惟鼎芬之於學務，……公實倚之」。<sup>29</sup>

在梁鼎芬的促動下，兩湖書院被建成為培養通經致用人才的新式書院，在教學內容、教學方式上均突破了專課八股制藝的舊式書院風格。他負責制定的《兩湖書院章程》則成為近代新式書院的範本。<sup>30</sup>書院的師資隊伍也有所更新，所聘教員皆為新舊學兼習的飽學之士，如經學教員易順鼎，史學教員汪康年、楊銳，文學教員楊守敬等，都是舊學各有專長，新學亦有素養者。<sup>31</sup>1902年，梁鼎芬又順應書院改制的潮流，對兩湖書院進行改造，更名為兩湖高等學堂，並對課程進行重大調整，確定為經學、中外史學、中外地理學、算學、理化學、財政學、兵事學等八門，使兩湖書院演變為包括文、理、法三科的高等學堂，開兩湖大學預科學堂設立之先河，為清末地方書院改制提供了借鑒。

此外，梁鼎芬還輔佐張之洞籌辦農務、工藝、軍事等各類專業學堂。1896年他輔佐張之洞創設武備學堂，次年又籌設農務學堂。在興辦各類新式學堂的過程中，鑒於師資力量不足，尤其是中學師資更為匱乏的狀況，1902年，張之洞在武昌城東賓陽門以南創設了第一所湖北師範學堂，梁鼎芬出任監督，具體負責學校一切管理事宜。<sup>32</sup>在師範學堂，梁鼎芬除設置普通課程外，還增加了教育學、衛生學、教授法和學校管理法等學科，並以東路小學堂附屬其旁，作為師範生的實習場所。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湖北師範教育初具近代規模。1904年，為進一步紓解各處學堂急缺教員的問題，梁鼎芬督同胡鈞等將兩湖高等學堂（原兩湖書院）改建為兩湖總師範學堂。並分設優級師範和初級師範兩等，以滿足不同層次學校的需要。最後，兩湖總師範學堂被建成可容納1200多人，具有近代學校性質的師範學堂。<sup>33</sup>學校建成後，梁鼎芬又被張之洞任命為學校監督，悉心秉承張之洞意旨，「以修行為基，以求實為主」<sup>34</sup>，竭盡全力培養「讀正史」、「崇正學」，忠君愛國，志在挽救中國貧弱的育人之師。<sup>35</sup>在張之洞與梁鼎芬的共同努力下，兩湖總師範學堂培養出大批具有近代文化素質的師資隊伍，為普及近代化教育奠定了基礎。

梁鼎芬協助張之洞開展了近代留學教育事業。1898年，他協助張之洞實現了派吳祿貞、吳祖蔭等20人赴日本學習軍事一事。1899年他們將12名學生派往日本學習農、工、商。<sup>36</sup>1902年7月，他們又將30名師範學生派往日本。<sup>37</sup>對倡辦遊學二人不遺餘力且樂此不疲。在致汪康年的信中，梁鼎芬說，「遊學東洋學生，已派20名。寫信之日到，一切甚費心力。與南皮合辦成此一事，……當一快也。」<sup>38</sup>其欣慰之情躍然紙上。

梁鼎芬與張之洞共同創辦了近代軍事教育。1902年他與張之洞商議在湖北創武高等學堂二所，一所「募德國教習三員教之」，分設戰法、輿地、測繪、算學、體操、軍械、台壘、步隊學、馬操、炮隊學十門學科；一所「略仿日本戶山學校，專取在營已有閱曆之武職官弁隊目，而又文理明順者充選，使之研求學術，增進智略，募日本教習五員教之」，設課目十三門：軍制、戰術、兵器、數學、衛生、操法、築城、野操、兵棋、測圖、戰術實施、技擊、軍醫等。他們力圖通過對軍事人才的培養，整飭落後廢弛的武備，提高清軍戰鬥力，從而拯救衰頹在即的清王朝。1904年梁鼎芬擔任張之洞所創新軍營務處首席提調。湖北新軍的成長與他的苦心經營息息相關。他「以一身兼新軍訓育統領重任」，「領導新教育，於新軍之孕育養成，為功至偉」。張之洞、梁鼎芬經辦新軍本來是希望其練成後能維護朝廷統治。但事與願違，湖北新軍恰恰是推翻清王朝的中堅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講，梁鼎芬「實亦間接有助於辛亥革命」<sup>39</sup>，這怕是忠君衛道的張梁二人萬萬料想不到的。

梁鼎芬還是張之洞改革封建傳統教育體制的高參。1902年，張之洞在湖北省成立全省學務

處，主管全省公、私立大、中、小學堂及留學事宜。梁鼎芬擔任了學務處的文學堂總提調，具體掌管全省文學堂的教育行政管理工作，負責制定和檢查各學堂的課程，學生畢業年限，教職員的任用等。<sup>40</sup>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相當於省教育廳一級的管學機構，它的設立有效地推動了湖北教育事業的發展。1904年，張之洞為加強學務處職能，在原來文武學堂總提調之上設學務處總提調一職。梁鼎芬又擔此重任，全權負責管理湖北全省教育工作。<sup>41</sup>他為提高學務處辦事效能，將其分為審訂、普通、專門、實業、遊學、會計六科，每科設專辦一人，幫辦若干人，使湖北地方教育行政管理機構初具規模。

梁鼎芬對自己和張之洞開創的教育業績頗感自慰，曾自題門聯「楚材必有用，教成君子六千人」。<sup>42</sup>張之洞更是充分肯定了梁鼎芬的教育功績，稱其「學術純正，待士肫誠，於教育事體，大綱細目擘畫精詳，任事多年，勤勞最著」，並請求朝廷賞加二品銜，以示鼓勵。<sup>43</sup>由此可見，在談到張之洞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時，梁鼎芬的功績也不應被忽略。

### 三、張梁交誼探因

梁鼎芬位卑言輕，其所做所為不為人盡知，惟有民初對亡清遜帝的忠孝言行播傳於世。因而，梁鼎芬有晚清遺老的名號，在人們看來似乎是封建頑固派的化身。而張之洞則以洋務後起領袖而聞名。表面看來，二人心路不一，又何以能長期共事，相得益彰呢？

第一，二人都主張經世致用。梁鼎芬與張之洞都生活在正統儒學的文化氛圍裏，走著讀書、科舉、入仕的人生道路。在治學的過程中，二人都走出了幹嘉考據學風，推崇通經致用。梁鼎芬治學不分畛域，反對存漢宋門戶之見，主張「學子化漢宋之名，以聖賢為歸」。<sup>44</sup>博采眾家之長，以求經世務實。張之洞也是貫通漢宋之學的經世學派。他以「仁厚尊家法，忠良報國恩，通經為世用，明道守儒珍」<sup>45</sup>為志向，「學術兼宗漢宋，於兩漢經師、國朝經學諸大師及宋明諸大儒，皆所宗仰信從」。<sup>46</sup>這一趨同的學術風格是張梁能相伴而行的一个內在文化因素。

其次，二人都以忠君衛道作為人生價值追求。張之洞願引梁鼎芬入幕，忠孝於朝廷則是其選擇的主要標準。儘管他「用人則新舊雜糅」，<sup>47</sup>能相容並包，但都離不開效忠朝廷這個大前提。在其所吸納的人才中，無論是思想守舊人士，如左紹佐、羅振玉，還是革新人士，如汪康年、鄭孝胥，亦或是奇才怪傑，如辜鴻銘等，都不能有逾越這個前提之舉。張之洞曾一度欣賞革命派人士章太炎，並試圖攬於自己門下，於1898年延其入幕至武昌鐵政局。<sup>48</sup>但終因章太炎「昌言革命」而將其逐出幕府。<sup>49</sup>梁鼎芬願入張幕，也主要因張之洞乃當朝一開明的封疆大吏，入其幕可一展難以徑自實現的忠君報國之志。

第三，二者均認同「中體西用」的文化觀。梁鼎芬入張幕後，在時勢的影響、實踐的磨煉中，他逐漸成為「中體西用」洋務思想的崇奉者。面對中法、中日戰爭中清廷的潰敗，喪權辱國條約的簽訂，膠州灣的被侵，瓜分狂潮的到來，梁鼎芬在反醒中逐漸走出「天朝上國」嚴夷夏之大防的思想禁錮，積極投身於洋務運動。張之洞所行洋務新政，梁鼎芬大多參與其中。或許有人說，這些乃是梁鼎芬奉命所為，並非出於主觀動機。我們認為不然。不僅在客觀效果方面梁鼎芬有參辦洋務之實，在主觀上梁鼎芬也是逐步加深對「中體西用」的理解的。在親涉洋務教育實踐中，梁鼎芬得以接觸、學習西方科學知識，潛移默化地接受了西學

熏陶，漸自形成「中體西用」的中西文化觀。在武昌時，他就收藏有許多科技圖書，倡導學生習讀，自己也常翻閱。<sup>50</sup>1894年11月，簡竹居曾致書梁鼎芬言兵事，主張「自立自強，不必師用外國之利器與人才」，梁鼎芬則持異議，明確提出「人才與軍械皆有不足之憂，竹居所言，偏而未通，非數紙可盡」，<sup>51</sup>承認中國有不如「夷」的地方，主張引進西方人才和軍事設備。他支援編印洋務書籍，傳播洋務知識，但要改變名號。如他說，「此間行西法，而必避其名，兵法堂定名後齋，體操廠改曰兵操廠」，<sup>52</sup>以掩洋務名目，從而緩和頑固守舊派的敵對情緒。戊戌政變前後，對康有為、梁啟超的討伐，他也是以「中體西用」的思想文化觀作為框架的。他反對驟行變法，但主張「法制已壞者修之，不足者采西法補之」，<sup>53</sup>即承認了可以「西學」之先進補救「中學」之不足。由此可得知，梁鼎芬已從經世務實出發，走上了謀求「西用」之路。但他又是身受正統儒學熏陶，素有深厚儒學根底的封建文人。在參辦洋務，謀求「西用」的同時，他難以割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依戀情懷，竭力維持封建綱常名教。「法制尊《周禮》，根原本《孝經》」，「詩書傳世澤，禮樂啟人才」。<sup>54</sup>他反復強調只有封建倫理綱常，忠信孝悌才是治國之本。對觸動中國傳統治世之道者，他必奮力相爭，捍衛正統。如康梁倡民權的變法言論就引起梁鼎芬的不滿，他先是「諍之」，繼而又「口誅筆伐之」。<sup>55</sup>至於張之洞，作為洋務後起領袖，「中體西用」文化觀的集大成者已是史學界的共識，自不需贅述。綜上所論，梁鼎芬與張之洞乃是思想趨同，志同道合之人，因此他們能相互援引，長期共事。

第四，二者均具有趨新與戀舊，趨時與附權的矛盾心態。對待維新派的態度是典型一例。起初，面對日益高漲的救國呼聲，梁鼎芬與張之洞均採取支援變法維新的態度，企盼能有救於時艱。因此，梁鼎芬向張之洞薦維新賢士：「康（有為）蒯（光典）二子，深相契合，兩賓相對可以釋憂」。<sup>56</sup>張之洞也因之而與維新派接觸，邀康有為長談，邀梁啟超至武昌會面，聘蒯光典主講兩湖書院。這體現出他們趨新的一面。然而，他們又都謹奉封建倫理綱常，處處以「中學」為本。1896年1月12日，康有為在《強學報》創刊號上發表《孔子紀年說》，使用孔子紀年。中國紀年歷來與執政王朝的皇帝相關，改用孔子紀年，則意味著「改朝換代」，這是忠君衛道者梁鼎芬、張之洞所不能允許的。梁鼎芬「雖主開新，而倫常君國之念終不可改」。<sup>57</sup>因此，他屢次勸誡康「議論宜平正，做事勿誇張」，並與康展開學術論爭。至1897年10月，二人會晤於上海時，仍在「論學術治術」，只是「益不合」。<sup>58</sup>對於維新派所倡民權說，梁鼎芬以「邪說」視之，並叮囑汪康年萬不可動筆再談。張之洞則認為，當時倡民權有害而無益，並「糾率許多漢學、宋學先生們著許多書」<sup>59</sup>與康有為、梁啟超等相爭辯。這又表現出梁張戀舊的一面。梁張反對維新派操之過急。他們「雖亦主張新法，以圖富強，而不尚激進，仍欲維持名教，以保聖道，反對偏宕急激之言行」。<sup>60</sup>但二人又主張緩進，從而表現出趨時心態。梁鼎芬曾勸告康有為變法自強關鍵在於漸進，指出「要在行之以漸，不可孟浪」，「君才如此，宜恭謹遜順，乃能有濟」，<sup>61</sup>必須採取穩重和緩的方式才能減少阻力，有所作為。張之洞也提出，「此時縱欲開議院，其如無議員何？此必俟學堂大興、人才日盛然後議之，今非其時也」。<sup>62</sup>正是這種主張緩進的趨時心態使得梁張同情、支援和參與維新。但二者又具附權心理，這使得二人緊隨政局變幻徘徊於帝、後之間，看「權」行事。戊戌政變前夕，政治風聲日緊，梁鼎芬洞悉「朝政實權，皆在太后手中」，<sup>63</sup>遂順後意，一改初薦康有為、蒯光典時語言，對康梁「一罵為賊，一詈為匪」。<sup>64</sup>他自己還「以君權相標榜，號呼載述，羅網踵後」，<sup>65</sup>向慈禧太后表明其赤誠盡忠的心跡。黃

遵憲在論及梁鼎芬對維新派前後有別時解釋道，梁鼎芬「及康罪發，乃取文梯參劾之折，彙刊佈市，蓋亦出於無奈也」。<sup>66</sup>看來，梁鼎芬附權已為時人所理解了。久處官場的張之洞更是諳熟為宦之術。朱峙三言張之洞為政秘訣即是「深知西太后的好惡，好其所好，惡其所惡」。<sup>67</sup>戊戌年，張之洞憑藉敏感的政治嗅覺察知形勢變化及時採取了附權措施。如他聽取梁鼎芬之言，推出《勸學篇》進呈慈禧禦覽便是一例。總之，戊戌維新時期，梁鼎芬與張之洞對維新派變法自強的一致態度充分展現出二人均具有趨新與戀舊，趨時與附權的矛盾心態。因而，在政治生涯中，他們能長期合作，相得益彰。

有梁鼎芬與張之洞一度交惡說。據劉禹生記載，1902年張之洞奉旨代劉坤一督兩江，因其甚是賞識端方，將端「引為同志」，遂密保端代替自己署湖廣總督。不料，待張之洞欲回任之際，「端方不欲交卸」，而是「運動樞府，召之洞入都展覲；覲畢，又令之洞留京訂學務章程」，且托學務大臣榮慶「對學務章程時持異議，屢訂屢改，困之洞於京年餘」。<sup>68</sup>直至1904年春張之洞方得回任。為此，張之洞甚惡端方。而在端方督湖北期間，梁鼎芬與之交好，盡其所能輔佐端方；端方離去時，梁鼎芬又於黃鶴樓立去思碑，上書「睢州之正，益陽之忠，滔滔江水，去思無窮」十六字，以示其對端方的眷念情懷。<sup>69</sup>張之洞沒料到自己一向引為知己的梁鼎芬竟有如此舉動，因而開始嫌惡梁鼎芬。回任後，他不願見梁，經多人勸說才予以接見，亦不過寒暄數語。<sup>70</sup>關於張梁交惡說，黃浚也有提及，「節庵欲為陶齋（端方）營謀事，為南皮所知，還鄂後對梁禮遇殊薄」，張還作詩一首「芙蓉霧夕樂新知，牛李裴回史有詞。未卜郎君行馬貴，後賢應笑義山癡」，詬罵梁鼎芬。其中「新知」即言梁鼎芬與端方新相結納。<sup>71</sup>

揆諸史籍，我們認為張梁交惡說恐是劉、黃二人的猜測。事實上，張之洞一直引梁鼎芬為知己。就在1904年3月張之洞回任前夕，他在《致武昌端署制台梁太守》電中，還命令「自日本調回學生及原在鄂學生，……前有電與節庵，言明如學生留鄂帶營者，均歸節庵統，不令他人統帶」。<sup>72</sup>同年8月4日，在他的《劄司道酌定營務處新章》中，梁鼎芬又被任命為督練新軍的營務處總辦。<sup>73</sup>在晚清將衰之際，張之洞將湖北新軍的訓育大權一併交給梁鼎芬，足見張之洞對梁鼎芬的器重。由此可推知，梁鼎芬仍是張之洞最信賴的人。又1905年梁鼎芬奉調任安襄鄖荊道，張之洞曾「設宴為先生（梁鼎芬）餞行」。<sup>74</sup>1907年9月16日張之洞仍上奏清廷，稱梁鼎芬對教育事業，勤勞最著，並懇請賞加梁鼎芬二品銜。直至入值軍機後，張之洞仍不忘致電梁鼎芬吐其肺腑之言，「到京十餘日，喘息甫定，時局日艱，積習如故，毫無補救，惟有俟冬春間豈骸骨耳」。<sup>75</sup>從上述材料可看出，自1904年至1907年張之洞進京，梁鼎芬一直被張之洞引為知己，無任何二人交惡痕跡。

梁鼎芬也從未忘懷張之洞的知遇之恩。張之洞去世後，梁鼎芬至南皮奔喪，痛苦之聲，壓過眾孝子。<sup>76</sup>梁鼎芬還為張之洞作挽聯雲：「甲申之捷，庚子之電，戰功先識孰能齊；艱苦一生，臨沒猶聞忠諫語。無邪在粵，正學在湖，講道論心惟我久；淒涼廿載，懷知那有淚乾時。」又云：「老臣白髮痛矣，騎箕整頓乾坤，事粗了；滿眼蒼生淒然，流涕徘徊門館，我何如？」<sup>77</sup>字裏行間充滿對張之洞的深切緬懷之情。此後，他坐火車每過南皮必肅然起座，面向東敬立，以示默悼。晚年在北京時，每逢月之十五日，必到張之洞祠前行禮。

縱觀梁鼎芬與張之洞二人的交往歷程，二人合作共事，相互維護與提攜一直是二人關係中的主要方面。張之洞成就功業，梁鼎芬的輔佐作用不能低估。

## 註釋

- 1 僅見傑公：《我所知道的梁鼎芬》，《張之洞遺事》，武漢文史資料1986年第1輯，第142頁；杜永泉：《清廷的忠誠衛士梁鼎芬》，《易縣文史資料》1990年第2輯，第41頁；智軍等：《梁鼎芬參劾李鴻章、袁世凱及其在廣東辦學等活動》，《廣州文史資料》，1963年第4輯，第195頁；《兩湖書院山長梁鼎芬》，《武漢人物選錄》，武漢文史資料1988年增刊，第358頁。
- 2 天臺野叟：《大清見聞錄》上卷，《史料遺聞（民國）》（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頁618。
- 3 吳天任：《梁節庵先生年譜》（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頁91。
- 4 翦伯贊等編：《戊戌變法》（上海：神州國光社，1953），頁643。
- 5 吳天任：《梁節庵先生年譜》，頁116。
- 6 湯志鈞：《康有為政論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29。
- 7 吳天任：《梁節庵先生年譜》，頁107。
- 8 黃浚：《花隨人聖庵摭憶》（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3），頁58。
- 9 湯志鈞：《康有為政論集》（上冊），頁170。
- 10 吳天任：《梁節庵先生年譜》，頁115。
- 11 《汪康年師友書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頁1895。
- 12 同上，頁1900。
- 13 同上，頁1896。
- 14 陳慶年：《戊戌己亥見聞錄》，《近代史資料》總81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頁133。
- 15 黎仁凱等：《張之洞與近代中國》（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1999），頁247。
- 16 吳天任：《梁節庵先生年譜》，頁127。
- 17 苑書義等主編：《張之洞全集》（保定：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頁7586。
- 18 翦伯贊等編：《戊戌變法》（二），頁643。
- 19 同上，頁645。
- 20 吳天任：《梁節庵先生年譜》，頁141。
- 21 黃浚：《花隨人聖庵摭憶·補篇》，頁115。
- 22 同上。
- 23 苑書義等主編：《張之洞全集》，頁1373。
- 24 劉禹生：《世載堂雜憶》（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68。
- 25 趙爾巽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頁12822。
- 26 吳天任：《梁節庵先生年譜》，頁64。
- 27 同上，頁70。
- 28 《武漢人物選錄》（武漢：武漢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1988），頁358。
- 29 張繼煦：《張文襄公治鄂記·序》（湖北通志館編印鄂故叢書之一），頁2。
- 30 苑書義等主編：《張之洞全集》，頁10271。
- 31 《張之洞遺事》，《武漢文史資料》，1986年第1輯，頁73。

- 32 苑書義等主編：《張之洞全集》，頁4193。
- 33 同上，頁4240。
- 34 吳天任：《梁節庵先生年譜》，頁156。
- 35 《張之洞遺事》，《武漢文史資料》1986年第1輯，頁75。
- 36 陳慶年：《戊戌己亥見聞錄》，《近代史資料》總81號，頁134。
- 37 吳天任：《梁節庵先生年譜》，頁155。
- 38 《汪康年師友書劄》，頁1912-1913。
- 39 吳天任：《梁節庵先生年譜》，頁192。
- 40 苑書義等主編：《張之洞全集》，頁4187。
- 41 同上，頁4254。
- 42 《張之洞遺事》，《武漢文史資料》，1986年第1輯，頁142。
- 43 苑書義等主編：《張之洞全集》，頁1816。
- 44 吳天任：《梁節庵先生年譜》，頁57。
- 45 許同莘：《張文襄公年譜》（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頁6。
- 46 苑書義等主編：《張之洞全集》，頁10631。
- 47 《張文襄公事略》，《清代野史》第6輯（成都：巴蜀書社，1988），頁106。
- 48 吳天任：《梁節庵先生年譜》，頁127。
- 49 《凌霄一士隨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頁558。
- 50 《張之洞遺事》，《武漢文史資料》，1986年第1輯，頁77。
- 51 吳天任：《梁節庵先生年譜》，頁110。
- 52 《張之洞遺事》，《武漢文史資料》，1986年第1輯，頁133。
- 53 翦伯贊等編：《戊戌變法》（二），頁644。
- 54 楊敬安輯：《梁節庵（鼎芬）先生剩稿》（臺北：文海出版社，1991），頁70、65。
- 55 翦伯贊等編：《戊戌變法》（二），頁644。
- 56 黃浚：《花隨人聖庵撫憶》，頁58。
- 57 吳天任：《梁節庵先生年譜》，頁122。
- 58 翦伯贊等編：《戊戌變法》（二），頁644。
- 59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海：東方出版社，1996），頁36。
- 60 吳天任：《梁節庵先生年譜》，頁132。
- 61 翦伯贊等編：《戊戌變法》（二），頁644。
- 62 苑書義等主編：《張之洞全集》，頁9724。
- 63 吳天任：《梁節庵先生年譜》，頁132。
- 64 黃浚：《花隨人聖庵撫憶·補篇》，頁115。
- 65 同上。
- 66 吳天任：《梁節庵先生年譜》，頁116。
- 67 《張之洞遺事》，《武漢文史資料》，1986年第1輯，頁53。
- 68 劉禹生：《世載堂雜憶》，頁57。

- 69 同上。
- 70 同上，頁68。
- 71 黃浚：《花隨人聖庵摭憶》，頁57。
- 72 苑書義等主編：《張之洞全集》，頁9131-9132。
- 73 同上，頁4243-4244。
- 74 吳天任：《梁節庵先生年譜》，頁202。
- 75 《廣州文史資料》，1963年第4輯，頁206。
- 76 《張之洞遺事》，《武漢文史資料》，1986年第1輯，頁15。
- 77 《凌霄一士隨筆》（一），頁393。

武增鋒 男，1977年生，河北大名人，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

韓春英 女，1975年生，河北豐潤人，歷史學碩士，河北省民政廳機關幹部。

---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十七期 2003年8月30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十七期（2003年8月30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